



# 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的危机控制

——斯皮瓦克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

G. C. Spivak

李应志 / 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成果

# 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的危机控制

——斯皮瓦克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

李应志 /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益刚  
文字编辑:陈 怡  
责任校对:湖 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的危机控制:斯皮瓦克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李应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01-013707-0

I. ①全… II. ①李… III. ①斯皮瓦克,G.C.—思想评论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6674 号



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的危机控制  
QUANQIHUA YU DIGUOZHUYI DE WEIJI KONGZHI  
——斯皮瓦克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

李应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28 千字

ISBN 978-7-01-013707-0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目录

导论：从后殖民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 .....	001
第一章 解构主义与斯皮瓦克的后马克思主义批评 .....	045
第一节 解构主义的思想谱系 .....	049
第二节 解构主义与斯皮瓦克的后马克思主义批评 .....	071
第二章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批判性重释 .....	107
第一节 劳动价值论的解构阅读 .....	116
第二节 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 .....	157
第三章 阶级的“消失”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控制 .....	167
第一节 阶级与阶级的“消失” .....	167
第二节 第三世界与西方阶级矛盾的宏观转移 .....	178
第三节 女性剥削与西方阶级矛盾的微观转移 .....	226

第四章 属民及其主体意识 .....	245
第一节 属民主体意识的策略性问题 .....	250
第二节 属民主体意识的再现性问题 .....	269
第五章 主体效果与属民主体意识的建立 .....	296
第一节 解构伦理与作为完全他者的属民 .....	299
第二节 斯皮瓦克的异质性批评和教学实践 .....	318
参考文献 .....	339

## 导 论

### 从后殖民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

盖娅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1942年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一所教会学校度过了中学时代，受到了较为良好的西式教育。中学毕业以后，进入加尔各答大学英语系。1959年，斯皮瓦克成为英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并获文学学士学位，同时获得英国文学及孟加拉文学金质奖章。1961年斯皮瓦克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在英语系，后转入比较文学系。1967年在导师保罗·德·曼的指导下取得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先后在爱荷华大学、奥斯丁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美国十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几乎全世界都留下了她讲学的足迹。<sup>①</sup>

对于斯皮瓦克的经历，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形容词是“双重性”，用她自己对解构主义的独特理解来说，就是始终处在“他者的世界”，即一种“既是又不是”的状态。她的父母是印度教徒，但都受到过高级教育；她的家庭属于上层中产阶级的低层，同时又属于下层中产阶级的上层。印度的独立是她儿时最主要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既不同于独立前的那一代，也不同于独立后的那一代。在中学里，老师是最底层的土著民，

<sup>①</sup> 曹莉：《史碧娃克》，（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页。

但他们又是有一定西方学养的基督徒；学校等级较低，但教学质量好；用的是斯皮瓦克的母语——孟加拉语教学，但又十分注重英语的学习。关于这一点，她对自己的父母一直充满极大的感激之情，她感谢父母没有把她送进当时更加高级时髦的西式女子修道学校或者更加不时髦的“本土”学校。<sup>①</sup> 斯皮瓦克在美国的处境难道不也是如此吗？相对于美国的主流人群，斯皮瓦克不管作为移民还是学者，都是一种“边缘”的存在，但是与其他少数民族中的成员相比，又有一定的学术“光环”和社会地位。在孟加拉，她是一个“美国人”，而在美国，她又是一个“印度人”，甚至在学术生活中被别人看成某种象征和“滑稽的‘领导’角色”，尽管她“在西孟加拉不扮演任何角色”。<sup>②</sup> 她曾对别人说：“我有一个母亲，那就是加尔各答，我也有一个富于营养的继母，那就是美国。两个都很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获得了批评这两个地方的权利。”“在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家的感觉”。<sup>③</sup>

可以这样说，斯皮瓦克身上的这种游离性，本身就是对于身份认同的一种解构，对于任何归类，她似乎都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存在。有意思的是，这种生活的具体性和多样性特征，也同样进入了她的学术和思想。例如，她通常与赛义德和霍米·芭芭一起，作为美国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评的“三剑客”而捆绑出现，并且在教科书中有着较为固定的座次，但相对于另两位学者而言，她显然又不那么“后殖民”。她的学术论题涉猎广泛，从历史、哲学，到政治、经济、心理学和文学，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到社会教育实践，理论领域横跨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学科。既讨论后殖民民族国家问题，也讨论女性、属民阶层问题；既有对殖民历史的批判，也有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研究。她的最初声誉来自于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翻译和解读，而使她名满天下的则是对于欧洲文学和哲学文本的后殖民批评，而

---

① 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10—11.

② [英] 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③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Harasym, Sarah e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82—83.

后人们逐渐看到，其实马克思主义才是她一以贯之的兴趣所在。由于多种学科知识的融合运用以及她极富争议和冲击力的批评实践，斯皮瓦克被称为一个“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sup>①</sup>同时也因为她一贯的马克思主义视野和立场而和齐泽克一起被认为是当代最具有冲击力的后马克思主义作家。<sup>②</sup>如此众多的领域和理论立场是否存在连贯的整体性？这个问题，斯皮瓦克本人的态度是“拒绝协调”，何况她自己从来就对自己的理论立场抱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解构主义者还是女性主义者，她对这些“标签”既有过确切的肯定，同时也在很多地方表示过明确的否定。<sup>③</sup>近年来，斯皮瓦克甚至对于自己的“后殖民”标签也越来越不满意了。因为她认为，“后殖民主义”过于关注历史上的殖民占领形式，因而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批评来说显得有些欠缺。<sup>④</sup>一方面，她把这种理论之间的相互碰撞看成是对传统真理观的颠覆，使不同的理论相互“打断”和“补充”；另一方面，她对自己学术的“非连续性”的强调，表明了她的主要工作在于讨论现实问题，而不是为了强化某种理论的权威地位。因此，她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类似于“牛虻”，让社会神经不至于麻木；也是一种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打杂工”式的工作：采用各种手边的工具和材料，只要方便，就拿来使用，目的是发现问题和保持问题的鲜活性。<sup>⑤</sup>

不过，尽管斯皮瓦克在经历和身份上具有双重性，但她始终是那个充满锋芒的批评者，尽管她的批评融合了众多并非相互协调的理论方法，但是要讨论和发现的问题却具有一致性，这就是对所有形式的“他者”，那些无权无势、遭受各种形式压制的弱势群体和个人的关注。有时候，

---

①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7, p. ix.

② Rey Chow, "Ethics after Idealism", *Diacritics*, Spring, 1993, p. 3.

③ Bart Moor—Gilbert,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Politics*, verso, 1997, p. 78.

④ Stephen Mort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3.

⑤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Harasym, Sarah e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55.



她也把这一对象称之为“属民”（Subaltern）。<sup>①</sup>其中既包括了被殖民的民族国家，也包括了性别对立中的女性、阶级矛盾中的工人阶级，种族问题中的部落人群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依附民族、南亚农民，等等，甚至本文认为也包括近年来斯皮瓦克较为关注的区域研究中的亚洲。简要说来，它是解构主义所关注的一切二元对立中的受到压制的部分，尤其是人之间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制。而在所有的这些压制关系中，她又始终关注与殖民和后殖民相关的帝国主义问题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问题，并且把这种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放进一个连续的历史整体来考察。换句话说，她对所有弱势群体的关怀，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这一历史整体挂钩，把他们所遭受的压制看成是这一历史整体的政治效应，这一历史整体也就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整体。正因为如此，她认为民族内部的差异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直接相关，而农村则成了“全球化的阵地。”<sup>②</sup>

事实上，斯皮瓦克对弱势者的关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非像某些学者在讥讽后殖民主义批评时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利用她所定居的发达国家的民主和开放态度，来实现向学术中心的移动。相反，这种关怀和批判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她在英国为应对二战而造成的印度大饥荒中出生，虽然自己的家庭条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对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有着深刻的印象。这些人的痛苦和反抗成为印度整个苦难岁月的缩影，加上后来她在大学所接触的各种人群，所受到的左翼知识分子激进思想的潜在影响，使得她能够比较自觉的关注各种压迫和不平等，这种关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例如，在谈及西方女性主义的“身体书

---

<sup>①</sup> 有的中文翻译为“贱民”，或者“庶民”、“底层人”、“属民”，等等。为了与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相区分，这里译为“属民”，取其“受支配”、“从属”的含义。斯皮瓦克对这个词的使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的替换，游动性是其特征之一，它随着实践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着较为强烈的解构和后马克思主义色彩。参见[美]加亚特里·斯皮瓦克：《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Stephen Mort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Routledge, 2003, p. 48；见拙著《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0页。

<sup>②</sup> [美]加亚特里·斯皮瓦克：《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页。

写”时，她联想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和人民的情况，认为那是一种“政治的身体书写”。她说：“在我的家乡有30万人都无家可归，住在大街上。小孩子在下水道大便，因为没有厕所。要是你看到那些大便的颜色，你就会知道他们根本活不长。”发达国家的工人可以失业，但他们有事干，在第三世界国家就并非如此。<sup>①</sup>

近些年来，斯皮瓦克做了大量“田野工作”，接触了大量的底层人群尤其是农村妇女，同时也身体力行地进行社会实践，包括孟加拉的底层教师培训，在阿尔及利亚参与“低收入住宅区的选举教育”，到中国西双版纳的乡村小学考察等，力图为她所说的“属民”人群的“属民性”（Subalternity）的改变做出一个教育工作者能做的努力，为了“属民”，“走到哪儿，教到哪儿。”<sup>②</sup>

斯皮瓦克对“属民”的特殊理解和对“属民”关注的一贯性，超出了我们对后殖民主义的一般理解，这也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斯皮瓦克对其“后殖民主义标签”的拒绝，并且，其原因可能还不仅仅是因为“后殖民主义”过多的关注历史的问题。鉴于斯皮瓦克所分析的“属民”问题与帝国主义历史、与当今国际秩序以及与资本全球化问题之间的深刻联系，同时也因为她分析女性属民时的政治经济框架，加上她的解构主义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紧密联系和她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关注，使我们得以有可能用一种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框架来解读斯皮瓦克的纷繁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批评。

退一步讲，尽管斯皮瓦克本人不太乐意接受“后殖民主义”的标签，但是她的批评与大量的后殖民问题相关也是确切的事实。也就是说，人们把她作为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来看待，把她与赛义德和芭芭等人放在一起也并不算是一种离谱的行为。但即使如此，后殖民主义本身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之间的联系也是十分明确的。尽管马克思在论述印度问

<sup>①</sup> [美] 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sup>②</sup> [美]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3—414页。

题的时候，他所说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观点引起很多人的争论，<sup>①</sup>甚至赛义德把马克思的这种论述作为东方主义的一个例证。但是马克思对于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对于殖民地人民的同情、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印度文化的肯定，也是表述得十分清楚的。<sup>②</sup>另外从现象上讲，不仅后殖民主义本身有诸如阿赫默德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也有斯皮瓦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等问题的大量论述。并且，事实上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各种讨论，很难脱离马克思主义这个关键词，这说明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可能的。只不过，仅仅就这些现象还不能说明这种关系的内在性，也很难直接看到解析这种内在关系的讨论，尽管在观点上，像罗伯特·扬这样的学者很明确地承认这种联系。因此，进一步解析说明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是必要的，并且，这也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弄清斯皮瓦克在后殖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特殊位置奠定基础。

##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殖民问题的地方并不少，<sup>③</sup>除了谈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问题的著名文章外，在《资本论》中分析原始积累时，马克思也把殖民掠夺看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认为财富的掠夺不仅产生自由劳动力和工资劳动，同时也使财富在投入生产循环的过程中

---

① [德]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第69页。相关争论可参考郑家馨：《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研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林华国《怎样认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论》，《历史教学》2002年第3期等文章。

② 对赛义德的马克思观的批判参见赵稀方：《赛义德与马克思主义》，《上海文化》2005年第2期等文章。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转化为资本。<sup>①</sup> 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较为明显的是把殖民扩张放在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阶段中来谈论的，其中心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殖民扩张。除此之外，马克思也谈到了殖民问题中的政治统治和军事占领问题，例如他对于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及中国鸦片战争的论述。但是总体来看，都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发展问题这个中心。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涉及到文化问题：诸如殖民主义对印度文化的破坏，对东方文化的肯定，以及对西方基督教在殖民主义中表现出的虚伪性所进行的批判等。但是，这些谈论都出现在他讨论的原始积累和人类历史演进等问题之中。例如在谈论原始积累时说到的基督教：“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都无法比拟的。’”<sup>②</sup> 事实上，马克思在殖民主义问题上留下的争论空间也是与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即所谓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论。因为原始积累的野蛮性，马克思表示了对殖民地人民的极大同情。但根据马克思的历史演进规律，资本主义对于东方封建社会的破坏就会被看成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代价，这在客观上使马克思留下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印象。这种殖民地人民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马克思并没有着力进行解决，但是却为后来者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留下了广泛的探讨空间。正如罗伯特·扬谈到的，马克思谈殖民扩张的时候，“主要是

---

<sup>①</sup>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页。之所以是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通过财富的掠夺可以产生自由劳动力和付酬的工资劳动，以及在贸易中把这些财富转化为生产循环中的资本，以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殖民制度大大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4页。

<sup>②</sup> [德]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页。

联系到它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或者是联系到英帝国的特殊情况，尤其是关于爱尔兰、印度和中国，这完全是他回应现实问题进行的评论。……在马克思的写作中，理论和历史特殊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生产性的紧张，从这个角度看，这为后来的分析，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提供了原初的模式。”<sup>①</sup>

当然，马克思之所以留下这一空间，是因为他关注的主要问题并不在帝国主义理论的建构上，在他的讨论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尤其是其经济关系和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问题。但是，其核心精神，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批判却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批判也包括了对资本主义殖民制度的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因为殖民制度可以强迫性地带来殖民地的历史进步而为它进行辩护，而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架欲望的机器具有永无休止的剥削动力和扩张本性，因而是必须予以替代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视野明显是超越了国界的，即强调替代过程中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换句话说，马克思虽然没有像列宁或者法依那样提供殖民解放的蓝图，但是其替代思想中却暗含了殖民主义问题。例如，马克思认为：“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sup>②</sup>言下之意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从一开始就与殖民主义相互纠缠，因此这一制度的彻底革命本身也就自然地包括了殖民地的解放问题。

当然，问题在于世界的当代历史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想，这种超出不是说资本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消除了马克思所看到的那些问题，而是说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变换了它的形式，这些形式使得此前马克思说的那些模式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和控制，即斯皮瓦克说的，帝国主义有了一种“危机控制的新方式”。资本主义似乎从马克思眼中的狰狞怪兽变成了让人欲罢不能的美艳妖魅，甚至在全球化时代化为一股青烟，变

---

<sup>①</sup> Robert J. C. 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1, p. 102.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7页。

成了消散于无形的“无物之阵”了。这些新的历史变化需要新的分析认识，也需要新的办法来进行应对。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实际上继承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本精神，正如资本主义并没有变换其实质而只是变换了形式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批评所改变的，实际上也是对资本主义新的危机控制形式的探讨以及相应的斗争形式，但批判的最终目标并没有改变。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决定论之外，弥补了文化问题这个维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框架。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问题是因为文化在阶级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是经济地位还不能自然铸就阶级意识。马克思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只是并没有考虑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展开。<sup>①</sup> 卢卡奇就认为工人阶级要促成行动，就必须首先造就整体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使人类免遭灾祸。换言之，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sup>②</sup> 那么如何铸就阶级意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概念。他认为一个特定的掌握领导权的政党，不仅具有集中阶级力量的作用，同时也是人们形成自觉的自我（政治）意识的基础。<sup>③</sup> 不过，这里的领导权就其首要的任务来说，是“文化的”领导权：“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定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它们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制定出与之相符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

<sup>①</sup> 参见 [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93页。

<sup>②</sup>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1—132页。

<sup>③</sup>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54页。

‘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sup>①</sup>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则没有过分关注政党在文化上进行“量身打造”的方式，而是探讨了其他形式的文化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阶级”并不是某个由于经济地位就自然而然形成的东西，阶级既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sup>②</sup> 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等内容都是工人生活中重要的经历，这些经历与经济生活相联系形成其历史经验的整体。汤普森在书中大量讨论了宗教、道德观念，通俗文化、文学以及激进的政治宣传等文化形式在这种觉悟形成中的作用：“一方面，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工人阶级或‘生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同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且其中还包含着日益成熟的建立新制度的意识。”<sup>③</sup>

但是文化对阶级意识的塑造并不是单向行为，而是在文化争夺的张力中进行。也许正是如此，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文化并不抱乐观态度，因为大众文化直接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和消费欲望相关，因此它更像是一种实现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工具，而不是工人阶级铸就阶级意识和反抗这一霸权的方式。与此同时，基于对包括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在内的“独裁国家”的考察，法兰克福学派放弃了阶级革命的想法，从文化到阶级斗争的两步走模式现在被集中在文化方面，文化斗争有取代阶级斗争的趋势。在阿多诺看来，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大众文化中的政治并不是立场鲜明的，因此进行整体的怀疑和否定才是较为可靠的斗争方式。并且，这种整体的怀疑和拒绝应该成为被统治阶级的持续的意志力。革命应该是“自发的”和“渐进的”，与任何体系、制度毫不相干，而且，“除了被统治者的意志之外，

---

①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② [英]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③ [英]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51页。

任何经济的或法律的措施都不可能导致制度的民主化”。<sup>①</sup>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拒绝是以批判理论来实现的，因为，立足于现实危机的批判理论就是实践本身。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绝对的批判立场已经变成了革命本身，以至于“进步”也是需要彻底进行批判的：“进步就发生在它结束的地方”。<sup>②</sup>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最为深刻的批判，但也悲哀地看到，马克思认为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的资本主义却成功地阻止了革命的途径：革命力量被分散，意识被同化，意志被消磨。资本主义利用了人类追求快乐这一“爱欲”本能，其秘密在于用“物质消费”这一“虚假的需求”压抑和掩盖“爱欲”的其他需求。因此，文化上的革命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心理层次，首先把被消磨的意志重新调动出来。<sup>③</sup>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重要的转折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德国“整体否定”和“理论就是实践”等观念的具体落实，即利用西方自身的学术发展成果对整个西方文化传统进行根本的自检和批判，并且直接把文化同政治实践连接，也就是文化的政治化。这一关键性转折主要是通过法国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来完成的。如果说“政治的文化化”可以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领导权）”概念来代表的话，那么“文化的政治化”则可以用福柯的“知识权力”概念来进行解析。前者依循的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路线，后者则是尼采、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自检和现代性反思的一个结果。而后一个结果之所以能够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是因为西方文化传统本身包藏着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根基，对这一根基的“整体否定”本身也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批判。并且，这一文化自检的核心也正在于对一切压制性关系的批判和否定。这一结合的关键点是法国结构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后结构主义，弗朗索瓦·多斯指出：“结构主义充满争议，并与一个特定的西

<sup>①</sup> [德] 霍克海默：《独裁国家》，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著：《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sup>②</sup> [德]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著：《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

<sup>③</sup> [德] 马尔库塞：《单面人》，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著：《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276页。



方历史时刻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自责、一种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拒绝和一种力图寻找新模式的现代主义的焦渴。古老的价值观不再得到尊崇。任何在西方历史中受到压制的事物，结构主义都表现出极端的敏感。”<sup>①</sup> 由于结构主义作为语言学转向的产物，通过科学化的方式对从笛卡尔到萨特的哲学主体概念进行了批判，而其中涉及的人性和理性概念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内在根据，因此结构主义的这种批判性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它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的可能。或者说，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政治化趋势。阿尔都塞明确地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并认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层面上的阶级斗争”，“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做是政治思想家……”。当然，阿尔都塞也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不能等同于现实的、直接的政治立场和哲学家们所持有的政治观念，因为“构成哲学的政治针对着并萦绕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即不是组织、巩固和捍卫这个领导权，便是同这个领导权进行斗争的问题。”<sup>②</sup>

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可以称为“理性”和“真理”的霸权。法国后结构主义虽然对结构主义也进行了批判，但它并非要与结构主义相反，去“捍卫这个领导权”，而是在程度上超越结构主义，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加彻底的“同这个领导权进行斗争”。

福柯通过对人文科学的“考古”，发现了各种“真理”话语系统中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关系。福柯认为，通过知识和“真理”这一基础，理性的“纪录规范性”得到建立，“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项伟大发明”。“真理是指一整套有关话语的生产、归路、分布、流通和作用的有规划的程序”。当然，这个“真理”与通常我们所说的真理有一定区别，它与“深层”知识和权力处在同一层次，是一个抽象的潜在

---

<sup>①</sup> Francois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Volume 1: The Rising Sign, 1945—1966*, Translated by Deborah Glassman,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 xx.

<sup>②</sup> [法] 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载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5页。